

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

肖东发

陈光中 著

燕南文丛 II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肖东发
陈光中
著

煮雨文丛 II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 / 肖东发, 陈光中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1

(煮雨文丛. 第2辑)

ISBN 978-7-5495-0896-9

I. 北… II. ①肖…②陈… III. 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982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635 mm × 965 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22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500 册 定价: 5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走进燕南园

(代序)

全世界有无数高等学府，论历史的久远，北大也许比不上牛津、剑桥、哈佛，然而，北大的精神魅力及其对国家民族的深远影响，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是独树一帜的。美国教育家杜威赞誉蔡元培先生时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是的，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沧桑背景，北大校园的风物，才同样幽深隽永。且不说城里沙滩红楼、民主广场记录下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奔波忙碌的身影，他们高举“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倡导文学革命，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建党的摇篮。就是城外西北郊的燕园也同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

燕园的风景足以让人流连，但只看湖光塔影，远不可称熟悉北大；只有了解北大（包括燕京大学）的历史，了解这里的学术大师，把人文和风物结合在一起，才能更懂得燕园的魅力所在。我们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探访北大的名人故居及其轶事。前些年，寻访了城里沙滩附近十余位大师的故居；近来，我们又把目光集中于燕南园。

去过燕南园的人都知道，那地方似乎很普通。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也许就是树多一些，人少一些。这里的树的确多，几乎所有的空地都植遍了。若是夏天，茂密的枝叶绘成一片铺天盖地的葱茏绿色，显得格外凉爽。绿树掩映之中，隐现着一些疏落的房屋，或是二层小楼，或是自成格局的小院，形态不

尽相同，但也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风格。有一点倒是是一致的：一律青砖灰瓦，没有任何奢华的装饰。也许，正是由于太多的树木把整个园子遮得严严实实，才愈发与周边的环境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大学校园是年轻人的世界，总是充满着青春的喧闹，那也就更加衬托出这方小小天地的幽静。平时，园中极少有人光顾，惟有长尾巴的灰喜鹊在树丛中飞来飞去，偶尔叽喳几声。清晨或是日暮，会有几位拄杖缓行的老人，互相遇见了，只简短地打个招呼，更多的时候是独自在甬道上漫步，似乎已经习惯于陶醉在这静谧的气氛中。而这持久的幽静不禁凝成了一丝奇特的有如圣境的神秘感。在这些绿树掩映的园中，留下过多少名师名士的恬淡睿智？

说来燕南园的历史并不算太长，还得从燕京大学的成立说起：

晚清的时候，美国教会在北京创办了三所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1919年前后，三校陆续合并，成为一所新的大学，并聘请正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著名美国教授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当时在校名问题上曾经有过一段小插曲：由于先行合并的是汇文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而汇文大学的英文名称是“Peking University”（即“北京大学”），所以合并后的学校曾经打算挂出“北京大学”的牌子，但是这与已经名播天下的“国立北京大学”几无二致，显然不妥。为此，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由蔡元培等人组成的五人委员会。最后，既没叫“汇文”，也没叫“协和”，更没叫“北京大学”，而是采用了诚静怡先生的建议，定名为“燕京大学”。这小小的插曲似乎也说明，燕京大学从成立的时候就与北京大学有了一种微妙的映照，或许是某种难解的缘分吧。三十多年后，新中国的教育系统推行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北大迁到了原燕大的校址——燕园。这样一来，解放前后京城四大名校中的两校就合流成为新的北京大学，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又焕发着昂扬进取精神的北京大学。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还是继续说燕大的事情。

由于当时燕大在城中的校舍局促狭窄，司徒雷登力图在京郊选择新的校

址。经亲自勘察，选定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本是明代米万钟的勺园与清代和坤淑春园的所在，几经易主，清末时归睿亲王的后代所有，因屡经战乱，已经破败不堪。后来民国时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了这处废园，原打算盖别墅的，司徒雷登千里迢迢跑到西安，几番谈判，最后以6万元的价格将其购下。

校址选定后，由另一个美国人——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设计师亨利·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墨菲以中国的园林艺术及古典建筑风格为基点，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而司徒雷登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连续10次回美国募捐，为燕大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1925年，新校园初具规模，燕京大学迁入新址，但校舍的建设还在持续进行着，先后又购入周边的蔚秀园、镜春园、朗润园等等，使校界不断扩大。

当时城里的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的教授有的自己购了房产、有的租了独院、还有的住在学校宿舍，燕京大学由于远在城外，教职员的宿舍区受到相当的重视，建于勺园旧址东侧的燕南园和东门外的燕东园，便诞生于那个时期。燕京大学在教职员住宅的建设上可谓精益求精、不惜工本，除了泥石砖瓦取自当地，其他建筑材料多由国外运来，那门扇窗框的木材都是上好的红松，就连门上工艺精良的把手也全由黄铜制成。房间里铺设了打蜡地板，屋角有造型典雅的壁炉，卫生间里冷、热水分路供应，每座住宅还有独立的锅炉房以供冬季取暖。家家门前屋后都有一个宽敞的庭院，花草林木格外繁茂。各自相对独立的庭院或分或合，在校园里形成了一个景色别致的特殊区域。与教学区和办公区飞檐斗拱大屋顶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迥异，燕南院和燕东园取的是美国城郊庭院别墅的模式，或小楼或平房，一色的灰砖外墙。

燕南园并不大，总共只有17幢住宅。然而，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80年来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差不多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比如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化学家张龙翔、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

沈同，法学家芮沐，文学史家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真可谓国宝云集！许多学府也各有自己的教职员专属住宅区，但是，像燕南园这样因名家荟萃而闻名于世的，只怕是还不太多吧。

对于燕南园，不同时代的学子有不同的感受。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孤岛”，燕南园被称作“根据地”，因为在这里，同学们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可以谈论抗战消息，《义勇军进行曲》不时在校园中飘荡。那时，曾有不少学生要转到后方或解放区去学习、工作。凡是要走的同学，学校都为他们送行，并资助一些路费。此外，或是由当时的学校负责人陆志韦或司徒雷登亲自出面，或是由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负责组织，邀请他们吃晚饭，叮嘱他们要记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要为祖国和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20世纪40年代末北平解放前夕，住在燕南园的中外教师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的家成了进步学生秘密集会的地点，地下党和学生组织经常在燕南园里开会。有一次，国民党军警包围燕大企图搜捕爱国学生，被列入军警黑名单的学生曾躲到到燕南园60号楼美国教授夏仁德家中，隐蔽在阁楼上。直到夜深人静，他亲自帮助学生跳出院墙，安全逃离。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学生把燕南园称为“北大的中南海”。因为，当时学校的主要领导——“五长”全都住在燕南园。如：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住63号；副校长、哲学家汤用彤住58号；另一位副校长、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先住57号，后与冯友兰对换住54号；教务长、理论物理、流体力学家周培源住56号；总务长、新闻学家蒋荫恩住55号；图书馆长、历史学家向达住50号……经数十年寒暑，燕南园先后迎来送走北京大学5位正校长、8位副校长、近30位学部委员和科学院院士。这里不仅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还留下不少情节各异的趣闻轶事。

燕南园是人们向往的地方。有过这样一个故事。在“突出政治”的20世纪60年代，曾经有一个图书馆系的毕业生站在燕南园里立下誓言：“奋斗二十年，走进燕南园！”为此，他被作为“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严重”的典型遭

到严厉批判。现在想来，这位师兄何错之有？燕南园是一个崇高境界的精神象征，能走进燕南园是无比的光荣。北大学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他们之中必然有人会跨入学术大师的行列，“走进燕南园”。

近年来，我们多次拜访了燕南园的一些老住户，其中既有芮沐、侯仁之、徐献瑜、林庚、林森等学界泰斗，也有宗璞、汤一玄、侯馥兴等师长前辈。当面聆听他们的教诲与指点，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其中一些人物已经离开了我们，想来颇感怅然。幸运的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大体梳理了燕南园的历史情况，汇成此书，希望借此留下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经历了八十多年风雨的燕南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纳过诸多住客，若是详细罗列，将是一部极长的名单。限于能力也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进行叙述，只能介绍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这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们只企盼这本小书能够引起一些读者的兴趣，有更多的人走进那神秘而神圣的燕南园，感受其氛围，发掘其精髓，在那些林间小径中继续寻找先贤的足迹，使其成为指引后人前进的路标。

肖东发 陈光中

2011年3月

目 录

	走进燕南园（代序）
001	一、燕南园50号的向达
009	二、燕南园51号的饶毓泰与江泽涵
025	三、燕南园52号的黄子卿与林焘
033	四、燕南园53号的齐思和与沈同
043	五、燕南园54号的洪业
057	六、燕南园55号的冯定与陈岱孙
071	七、燕南园56号的周培源
083	八、燕南园57号的冯友兰
107	九、燕南园58号的汤用彤
117	十、燕南园59号的高厚德与褚圣麟
123	十一、燕南园60号的夏仁德与王力
139	十二、燕南园61号的侯仁之
157	十三、燕南园62号的雷洁琼与林庚
171	十四、燕南园63号的马寅初与魏建功
191	十五、燕南园64号的翦伯赞
199	十六、燕南园65号的芮沐
211	十七、燕南园66号的冰心与朱光潜
239	后 记

一、燕南园50号的向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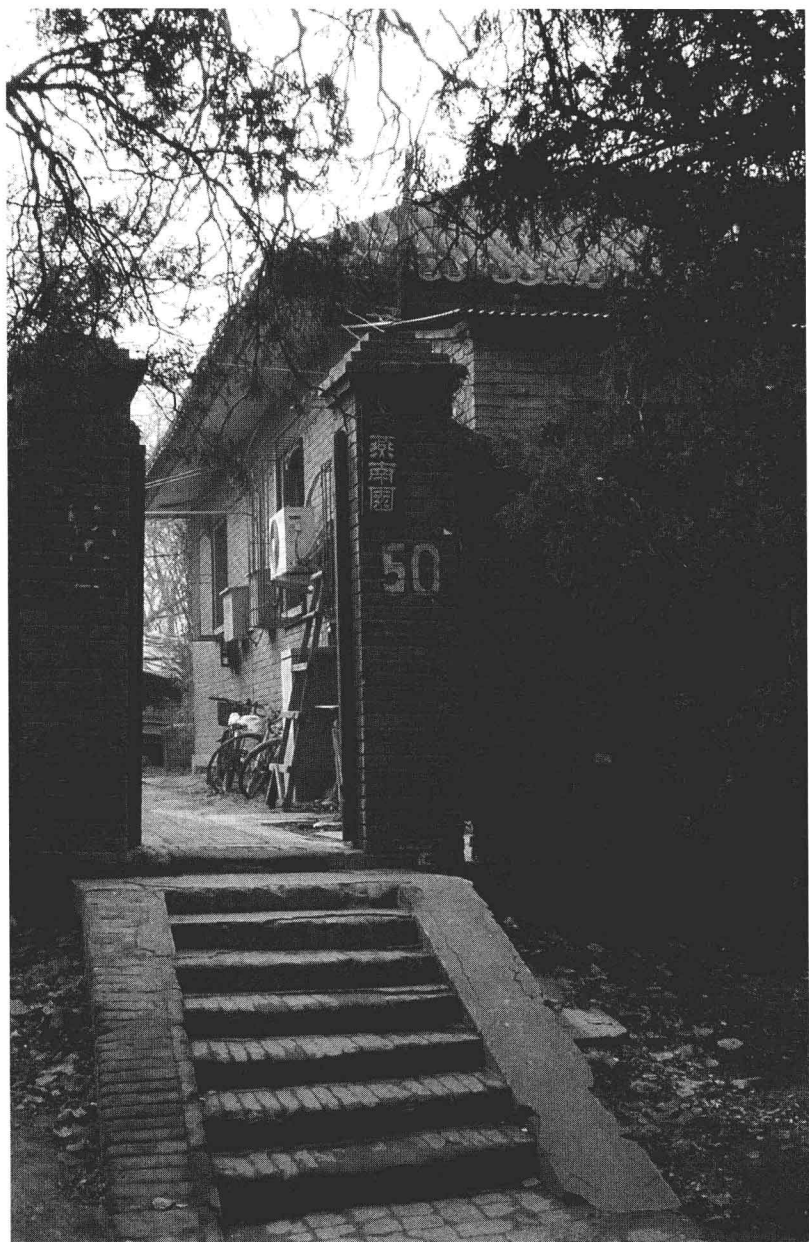
北大燕南园的17座建筑形态各异，似乎代表着他们的主人那卓尔不群的个性。从校医院往东，第二体育馆以南有一个入口，燕南园里的居民称之为“大上坡”。路南就有一幢不起眼的平房，从建筑风格上看，似乎与园内的其他房屋不是同一时期的产物，但它的门牌却标明是“燕南园50号”。原北大图书馆馆长、历史系教授向达曾在这里住过。

向达是土家族人，1900年2月19日生于湘西溆浦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目录版本学家。他以研究唐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著称，代表作有《唐



向达先生

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西交通史》、《唐代古刊本考》等，对我国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与传播也有深入研究。五四运动之际，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南高师，受到柳诒徵和陈鹤琴的赏识。大学毕业后，他投考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英文见习编辑，26岁到29岁之间就发表论文及翻译文章近20篇。1930年，经赵万里介绍，出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与赵万里、王重民、孙楷第、贺昌群等一起切磋学术，商讨问题，为日后的



燕南园50号院门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4年向达到北大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考”，一年后，被北平图书馆派往英法等国，重点考察流散的敦煌石室遗书。他每天扎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发现中国没有的书籍、资料或不同的版本，就采用照相、晒制蓝图或手抄的方式保存下来，密行细书累计几十本。向达从不炫耀自己的收藏和秘录，但遇到别人研究需要的时候，毫不吝惜自己的珍藏。郑天挺在《向达纪念论文集》的“序”中，曾回忆了向达多次毫无保留地借给他资料的事情。

1941和1943年，向达受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约，先后两次赴河西敦煌发掘考察，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敦煌学”的学术论文，他还翻译过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等书和文章，多次谈到他自己之所以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特别是敦煌学的研究，就是因为对外国强盗劫夺我国文物和艺术瑰宝之行为极为愤慨，要与他们争一高低，让我国西域文明与敦煌文化艺术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熟悉向达的人都交口称赞他为人耿直，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尤其鲜明。无论是在教授会议上，还是其他场合，每当讨论学校对于学生罢课游行应持什么态度的时候，向达总是首先发表意见。他认为青年学生在全社会中最纯洁无私，最富于正义感和爱国热情，也最敢做敢为，不像自己这样年纪大的人那么畏首畏尾、顾虑重重。他还举出许多生动事例，结合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冷静分析来说明他所以支持学生运动的道理。这里交织了他对年轻人的爱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恨，充分展现出一个正直无私、敢怒敢言的爱国者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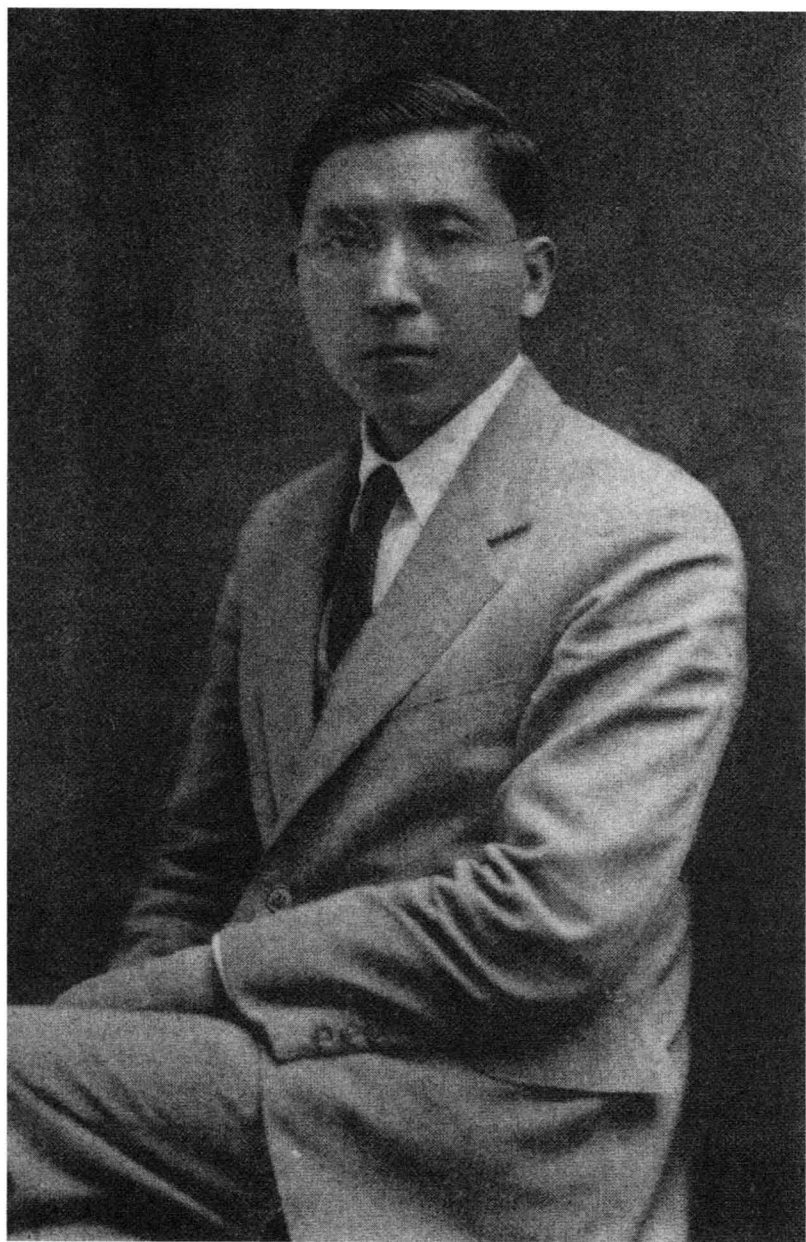
阴法鲁、白化文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46年12月31日，北平发生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特务分子公开在北大民主广场撕毁进步学生有关罢课斗争的布告和标语，向达立即上前制止，他严正指出：“你们就是反对罢课，也不能撕毁别人的……，因为在北大，任何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北大四十八年光荣历史被你们丢尽了。”暴徒们大吼：“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讲话？”他一字一顿地回答：“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姓向名达。”特务们骂着挥拳打他，

广场上的学生立即赶来保护他，把他劝走。他当即找到校长胡适，提出辞职，直到打他的特务学生被开除才罢休。为此，他在国民党反动特务拟定的黑名单里，名列第三。1947年，向达得到一年的休假，原本有机会到美国去讲学，而且还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美金。但他不愿意离开危难中的祖国，毅然放弃这一到美国的机会，改到南京筹办展览。学校师生称赞向达的爱国行动，为他开了一个欢送会，并在一块白绸子上签名以表达对他的敬仰之情。

1947年，他与王重民教授等学者大力促成在北大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附设在中文系）、博物馆学专修科（附设在史学系）。现在这两个专修科经过6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海内外闻名的信息管理系和考古与文博学院。从1949年起，他兼管北大图书馆的事务。解放后，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一批委员之一，还担任了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北大图书馆馆长。他对北大



燕南园50号院内



向达先生1936年5月11日摄于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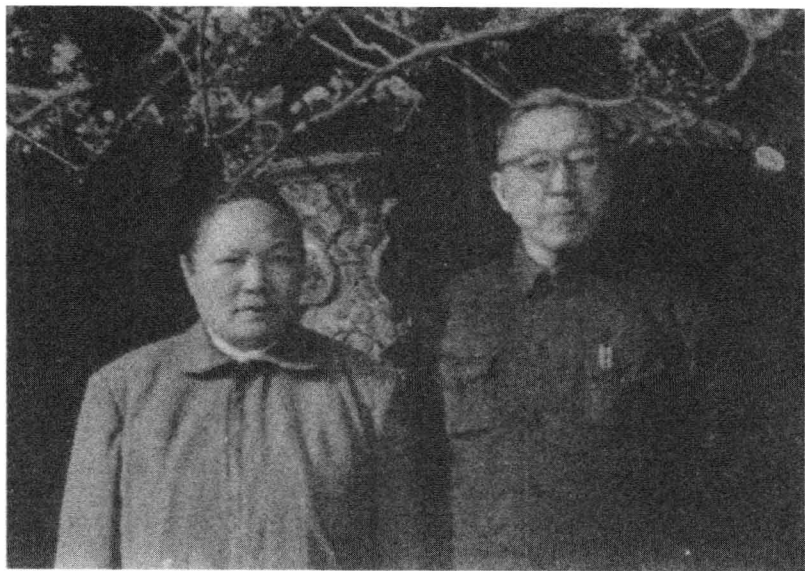
藏书了如指掌，师生们经常可以看到在馆长办公室门前的廊子里，或远或近地站着三五个穿布大褂的中年人，身旁放着一个布包。他们便是送书到图书馆来请向达亲自检选购买的旧书店伙友。向达1952年对新入学的图书馆系的新生讲话，谈到他的办馆思想——办好图书馆要注意的是藏书、人员、科学管理和服务精神，并在北大付诸实施，可以说在管理和建设北大图书馆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向达毅然送自己的小儿子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二年，党和政府请他参加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他先后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向达的生平档案中，曾有如下评语：“富于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对5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表示不理解。”向达深受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他自认为是党的诤友，1950年，曾公开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五方面的讨论），在学术观点上，也应该百家争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说，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他出言无忌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最为严重的是被诬为有攫取湖南省土家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于是，新旧账一起算，1958年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为史学界第二号大右派。

划了右派之后，向达从他自认为是党的诤友的地位被打入了另册。从此他不再批评时政，却仍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接受交给他的任务，并提出建议。如他曾接受整理柬埔寨古代史料的任务，以及有关中印、中朝边境问题的咨询。他深信“近百年来，某些有关边界问题的材料、地图，有关国家政府的档案、调查报告等，公私收藏都很缺乏。因此，事到临头，不免有手忙脚乱之感”。



1948年3月3日向达先生与郑振铎先生（左二）等



向达先生六十岁时摄于北大，旁为夫人郑宜君

出自爱国的责任感，他向有关部门建议，希望今后“未雨绸缪，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1966年春天，向达和商鸿逵为北大历史系制订了更为庞大的科研计划，并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逐步付诸实践。不料，着手不久，运动来临，工作遂而中断。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历史系邹衡教授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达已是六十六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此时已遭到如此折磨的向达，还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将如“凤凰涅槃，获得新生”。无奈事与愿违，他身患重病，不但得不到及时治疗，还要接受劳改和批斗，自诩身体健康如“铁汉”的向达，再也无法忍受折磨，终于在1966年11月24日含冤而死。“文革”结束后，向达得到平反，他的藏书和手稿都由家属献给北大图书馆收藏，其中有不少珍本、善本，这是他对北大、也是对国家的又一贡献。